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

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

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

呂妙芬 主編



中央研究院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

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

呂妙芬 主編

中央研究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 /

呂妙芬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2013. 10

面；公分. --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第四屆)

部分內容為英文

ISBN 978-986-03-8717-9(精裝)

1. 儒學 2. 文集

030.8

102022346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家庭、宗教、物質的網絡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發行人：翁啓惠

總編輯：黃進興

主編：呂妙芬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

印刷者：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出版日期：2013 年 10 月

GPN 1010202478 ISBN 978-986-03-8717-9 (精)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文責。

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 余英時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召開國際漢學會議是在一九八〇年，原本希望以後每十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四屆，但距第三屆已十二年，算是遲了兩年。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人提議本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他認為台灣的漢學研究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這一提議卻引起了她對於所謂「漢學中心」的記憶和感慨。他說：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陳援庵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現在法國的伯希和等老輩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漢學家現在連唐、宋沒有標點的文章，往往句讀也被他們讀破了。所以希望漢學中心現在是在台灣，將來仍在大陸。

但六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漢學中心」說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試一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間漢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詭的景象：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但是漢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卻並不獨立存在，因為漢學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學科之中的，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之類。

第二，二戰以後各國漢學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不用說，漢學研究在各國活躍的情形頗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躍的國家也未曾取得公認的「中心」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分別考察各國漢學研究的大體趨向，便不難發現：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漢學研究的傳統也不能不是多元的，這是我們今天共同承認的基本事實。

基於以上兩點新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年最所縈心的「漢學中心」何在的問題，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堅持要在這個問題上討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祇好說：漢學猶如十六世紀布魯諾（Giordano Bruno）構想中的宇宙，其中心無所不在，其邊緣則無所在（“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

自本院一九八〇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起，我個人每一屆都曾參與準備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們的唯一目的便是給世界各地漢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充分交流的學術平台，所謂「漢學中心」問題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我們承認並且尊重每一地區漢學傳統的獨特風格，但是我卻不願看到任何漢學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閉的道路。因此不同傳統之間的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和互相影響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相信，過去本院主持的三次會議多少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也能作出同樣的貢獻。

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感謝各地漢學同道們前來參加會議，特別是遠道冒暑而至的朋友們。我預祝大家有一次成功而愉快的學術聚會。

我個人因事不能到會，謹致最深的歉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在 1980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後以約 10 年的間隔舉辦一屆，至今已至第四屆。2010 年初我奉翁啓惠院長的任命，擔任副院長一職，當時思考著幾件應該進行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漢學會議。在翁院長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順利召開，上距第三屆已有 12 年，而距離第一屆更超過 30 年。30 多年來，與會的學者在改變，討論和關注的議題也隨著時空的推移，不斷的變遷。

當代社會資訊發達，空間距離縮小，連帶促進了地球村的形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漢學」已不再是專屬華人的學問，而儼然成為國際性的議題。學者關心的議題，也不再限於一時一地，而更多跨領域甚至跨國界的觀照。

從這一屆所發表的論文觀察，我感到較諸以往有幾點不同。在這裡僅以史學為例，從「主題」、「材料」與「工具」三方面略作討論。

首先是「主題」的擴展，以歷史研究為例，早已跨出傳統「帝王家譜」的框架，進而更多關注基層社會的歷史，關心人民的生活。討論的議題幾乎可說已經沒有局限而充分展現多元。

從「史料」方面講，傅斯年所揭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繼續得到重視與發揚。尤其近年來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大幅改變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這裏所說的新材料，不只限於考古出土的史料，還應該包括過去被列為禁燬或長期處於邊緣的史料，這些以往不能看或不易看到的東西，經過大量的刊印後，如今都觸手可及，無異於「新出土」，提供給學者們一個研究的新寶庫。此外，許多數位化資料庫

的建立，使得過去數十年皓首窮經都做不到的事情，現在也許一個按鍵彈指間就可獲得，為學者帶來無窮的「近用性」。當然，我也必須強調，「檢索」不能代替閱讀。

從「工具」而言，科技帶來許多研究的新工具，數位工具的興起，使研究者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得到全面的改變。另外如 GIS 的應用，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事情，也使得研究的面向從單點連結到多點、甚至擴展為全面。這些新工具的產生及應用，是過去幾屆漢學會議所無法想像的事。當然，以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第五屆時必然會有更新的工具出現，其新異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成功召開，首先要感謝翁啓惠院長的全力支持，余英時院士慨允擔任大會主席，黃進興院士和黃樹民院士力任艱巨。世界各地學者的熱烈響應，更是我們必須表示敬意與謝意的。

在會議召開一年後，全帙 22 冊的會議論文集得以出版，這要歸功於出版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以及李宗焜博士、葉光輝博士與各冊主編和學者專家的配合。不論會議期間或出版過程，還有無數的助理同仁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全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謹代表中央研究院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序

大會祕書處

二〇一〇年四月，翁啓惠院長由於關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指示，籌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語言研究所會同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單位，共同配合辦理。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遂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如期召開大會。各國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二九二位，主持與評論者計四十三人，全體與會人員更達一千六百之眾，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會議具有四大特色：首先，進行深度討論，會議論文發表者，兼做主持人與評論，角色彼此替換；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區的探討；其三，新領域與新議題的開發與探索；最後，迥異於往昔只有資深學人參加，此次廣邀富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與會，副教授以下達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會議期間，雖值颱風侵襲，與會人員一本初衷，風雨無阻，踴躍出席，討論熱烈，成果甚為豐碩。會後，復承王汎森副院長交待，成立編輯委員會，審議提交論文，俾便結集成冊。茲將最後定稿梓行，以供學界分享，並就教於諸方大家。

最後，本會議論文集得以刊行，必須感謝各分冊主編，尤其是出版委員會的編輯祕書李宗焜教授。

謹列本屆國際漢學會議攸關工作人員如下，並致謝忱：

主席兼召集人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秘書長兼副召集人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秘書長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執行秘書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恭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鄭秋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顧問（依姓名筆畫順序）

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賡武（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郝延平（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莊炳煌（中央研究院院士、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許文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中央研究院院士）

葉文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目次

余英時	開幕致詞.....	i
王汎森	序.....	iii
大會祕書處	序.....	v
呂妙芬	導言.....	1

楊儒賓 (Rur-bin Yang)

理學家的靜坐治病、試煉與禪病.....	9
---------------------	---

彭國翔 (Guoxiang Peng)

周海門與佛教——歷史與思想.....	47
--------------------	----

呂妙芬 (Miaw-fen Lu)

明清之際儒學生死觀的新發展	103
---------------------	-----

許齊雄 (Koh Khee Heong)

理學家的思想與家族實踐：李光地與安溪湖頭李氏家族	131
-----------------------------------	-----

Cynthia Brokaw (包筠雅)

“Spreading Civil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Impri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5
--	-----

Joseph McDermott (周紹明)

Rare Book Collections in Qing Dynasty Suzhou: Owners, Dealers, and Uses	199
--	-----

導 言

呂妙芬

第四屆漢學會議，近代史研究所以知識轉型、政治外交、性別史、儒學研究爲主題，舉辦數場研討會。本冊所收錄的六篇論文是屬於明清學術文化史領域，其中四篇中文論文當時在「儒學、家族與宗教」的場次中發表，兩篇英文論文則發表於「知識傳播與媒體」的場次。雖然就內容而言，受限於會議原先的規畫，無法構成主題非常集中的論文集，不過六篇論文之間仍有不少呼應之處。

「儒學、家族與宗教」的場次以明清儒學（理學）爲主要研究範圍，四位撰寫人在會議籌畫期間已充分溝通，選擇以「家庭」和「宗教」兩個主軸來構思論文主題，並希望能兼顧思想觀念與社會實踐的討論。這四篇論文內容包括儒學的人觀、身體觀、生死觀、家庭人倫觀、禮儀思想，以及儒者在家庭日用人倫中的禮儀實踐和宗族建設，儒學在實際生活中與不同宗教的交涉和對話，儒學教義與修身成聖的關係、工夫實踐與身體健康的關係等，四篇論文涉及的重要時代背景則是明清時期儒學與其他宗教的密切互動。兩篇英文論文的內容屬於書籍史的研究，出版文化與書籍的流通是知識觀念傳播的重要條件，也與政治、經濟、學術、文化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兩位論文發表人在這方面都已有重要專書出版，¹ 此次發表的論文是他們根據自己多年研究心得撰寫兼具宏觀性視

1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野與微觀個案的專文。

楊儒賓〈理學家的靜坐治病、試煉與禪病〉一文討論宋明理學家因靜坐工夫而導致的身體反應。作者以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個案，說明靜坐所引發身體正、負兩面的不同結果。簡言之，靜坐確有治病強身的療效，也能強化人面對壓力和痛苦的能力，但是也有不少人因靜坐而偏離身心正常狀態、走火入魔，此即作者所謂的「禪病」。除了身心偏離正常狀態之病癥，作者在第五節更討論偏離儒家價值系統的「異端之病」，並在結語中對於「何謂病」有進一步討論。

「異端之病」涉及宗教或學術的基本教義。就儒學而言，主要就是五倫所代表的家庭與政治倫理，此是傳統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儒學認為足以安天下的綱常名教。被判為異端的修道者本身未必感受到身心偏離正常狀態，然而在「五倫即天理」的信念下，他們卻被其他儒者視同精神癲狂。這部分的討論讓我們更多思考傳統儒學所堅持的基本倫理道德，也與其他三篇論文所探討的主題，如儒佛之辨、如何成聖不朽、家禮實踐等，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此文也引導我們更多思考有關思想觀念和身體經驗互相限制、互相建構的關係，啟發更多研究。我們知道宗教教義與實踐者體悟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基督宗教的靈修傳統雖強調效法基督、與耶穌有親密的關係，但信徒對於自己靈修經驗的表述很少是與基督完全合一，此和基督宗教教義中的上帝與受造人類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差異有關；相對地，東方靈修傳統對於悟的經驗表述則更多以天人合一的方式表達。而即使看似相近的悟道經驗，在不同宗教中也有不同意義。² 理學家的靜坐方法既受到佛老的深刻影響，在體悟的經驗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6); Cynthia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 2 Robert M. Giomello, "Mysticism and Meditation", in Steven T. Katz ed., *From Mysticism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70-199.

上也有類似的表現，晚明理學更有融合三教的傾向。但對於那些認為有必要在教義上與其他宗教作出區隔以確保儒學的獨特性的儒者們，他們將如何強調自己義理與工夫實踐的獨特性呢？晚明鄧豁渠（1498-1578）、李贄（1527-1602）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明清之際儒者對於終極存有的天道觀及家庭人倫的強調，均與此有關。

彭國翔〈周海門與佛教——歷史與思想〉一文討論晚明周汝登（1547-1629）與佛教的關係。論文先詳述周汝登與僧人的交往、幫助佛寺募緣、參與佛教典籍編輯並推動流通的作為，接著分析周汝登思想與佛學的交涉，包括他如何看待佛教、如何利用佛教方法與觀念來詮釋儒學、如何以儒學詮釋佛教、如何看待儒釋之辨，最後則試圖從周汝登個人生命經驗，說明親人的亡故與族人周夢秀的接引是使他深入佛教的重要原因。

這篇論文觸及理學與佛教在用詞觀念上的互相援引與轉用，相互詮釋又試圖保有本身立場的複雜對話過程，也指出周汝登不輕言儒佛之辨，更強調身心性命的實踐體會與真實生命安頓的重要。此處又觸及前文所論修道者主觀身心體驗與基本教義之間如何彼此建構、彼此規限的問題。周汝登對於不同宗教之間的會通融合，抱持較寬容的態度，他相信人「心性之根宗無二」，即相信最高的道體是唯一不二的，不同的宗教都是具體歷史文化對於「道」的一種體悟和詮釋而已；雖然有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在道體的層次上。他也相信人通過心性修養工夫，確有可能悟道。這樣的信念讓他可以欣賞、容許不同宗教對天道和理想人格的不同詮釋，也代表了晚明融合三教的一種態度。儘管如此，周汝登自己對於儒學的核心價值，包括家庭人倫職責、仁義道德還是堅持的。換言之，他的儒家立場仍然明確，而且屢屢強調在家庭中學道、克盡人倫的重要性，這也是他不像鄧豁渠般被視為異端的原因。

呂妙芬〈明清之際儒學生死觀的新發展〉一文考察大量明末清初理學文獻，指出當時理學家很關切生死的議題，對於人死後的情狀也有許多想象與描述，甚至出現類似個體靈魂不朽的概念。論文指出，許多明

清儒者都不滿意程朱「人死氣散無知」的看法，堅持舜（聖賢）與跖（愚凡）死後絕不會有相同的歸宿，他們更願意相信個人的道德成就具有永恆的價值，會對修德者個人的死後狀態造成關鍵性的影響，他們也相信聖賢死後神靈不散。清儒的論述透露著對於儒學道德價值的終極信念，及對儒者對於個體性不朽的追求。同時期的理學文獻，也讓我們看到許多關於儒家「天堂」的想像：在帝左右、長侍孔子之側、聖賢神靈永恆會聚的異象，是常見的表述，也是一些修德士人真心企盼的永恆歸宿。

另外，論文也說明清初理學思想在生死議題上的關注與討論，確實承繼了晚明的理學繼續推進。然而，明儒與清初儒者對於成聖的工夫論是否有不同？對於清初儒學的主流思潮而言，家庭人倫在成聖工夫中占何地位？家庭是儒者唯一的修德場域嗎？這些後續的問題在這篇論文中尚未能仔細探討，但已稍有觸及。清初學者對於這些問題有相當明確的答案：他們強調只有克盡五倫和家庭職責的孝子，才可能成聖。³ 換言之，家庭人倫與個人不朽生命的追求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此也提醒我們應進一步思考儒者對於家庭血脈與聖賢道脈之間的認同、兩者如何協商共存等問題。

許齊雄〈理學家的思想與家族實踐：李光地與安溪湖頭李氏家族〉一文則帶我們回到地方家族與思想交會的領域。李光地（1642-1718）是康熙朝重要理學名臣，過去對他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朝廷的君臣關係、李光地的個人品格、學術思想歷程和經學方面，許齊雄則把研究的焦點拉回李光地在福建安溪湖頭的家族，從宗族史的角度著手，並以李光地對於宗祠祭禮原則的討論為核心，試圖將李光地個人的出身、經歷，與其對禮制的看法結合。論文除了對於李氏家族歷史、李光地一支對宗族建

3 這方面的討論在第四屆漢學會議原先發表的論文中曾有論及，後因求議題焦點更集中，將之獨立出來撰寫成文。呂妙芬，〈儒門聖賢皆孝子：明清理學關於成聖與家庭人倫的論述〉（發表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清代理學國際學術會議」，2012.10.29-30）。

設的貢獻有詳細說明外，對於李光地主張以官爵身份決定主祭者，及其對於大宗法的祭典以主祭孫、宗孫、直祭孫三者為中心的考量如何反映李光地本身的地位和處境，也有詳細討論。當然，李光地之所以能夠如此主張，或這樣的主張能夠被社會所認可，也因為這樣的問題確實普遍存在，並反映許多現實的關懷，類似的看法與作法在明清歷史中也有許多先例。另外，此文也論及李氏家族與地方宗教（寺廟）的密切關係，提醒我們理學家的生活中除了祖先和族人、儒家聖賢之道的傳承，尚有許多民間宗教的神靈與祭祀活動。

祖先祭祀的家禮之所以重要，除了有敬宗收族、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外，也與人們對於死後魂魄歸屬的想法，如何處理生者與亡者的關係，如何界定家庭與家庭人倫價值等密切相關。許齊雄的論文雖集中討論李光地的個案，不過內容也與儒家禮學、福建地區家族文化史相關，透過微觀與宏觀的交互映照，從家族、禮學、禮儀實踐的角度豐富李光地的研究。

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的論文“Spreading Civil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Impri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探討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商業出版與書籍流通的情形。作者從雕版印刷的技術人才培養、人事和紙張成本、刻工分布與出版業運作機制等層面，說明中國傳統雕版印刷的行業特色為何能持續生存，並如何影響中國書籍生產與流通的情形。作者在簡要交代官刻、私刻、宗教刊刻、商業出版的不同類別之後，將討論焦點放在商業出版。論文簡要說明了中國從宋元到明清時期，出版中心與書籍流通管道及模式的變化趨勢。論文後半更以江西潯灣、福建四堡兩個個案，說明清代出版業與書籍流通模式的另類發展。四堡書商在小鎮和鄉村開拓新的書籍市場，將知識帶入偏遠與下層的社會；潯灣的例子則讓我們看到出版於一個小地方的書籍向各地運銷的情形，此都說明了清代書籍出版地與流通的管道，已遠比明代更多元、更複雜，多方向交織的流通網絡已逐漸形成。最後，作者也藉由本文的分析，說

明中國近世出版業與書籍流通日益多元而複雜的發展，一方面有助於社會與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可能促進某種地域本土文化的保存與發展。

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的論文“Rare Book Collections in Qing Dynasty Suzhou: Owners, Dealers, and Uses”討論清代蘇州地區善本書收藏、買賣與使用的情形。除了簡介近世中國善本書的主要分佈地，作者也介紹清代蘇州重要的藏書家族，並說明這些家族如何保管、傳承、處理藏書，他們遭遇何種困難，以及太平天國對於蘇州地區藏書的嚴重破壞。文中對於黃丕烈（1763-1825）這類學者型的書商如何以專業知識從事古籍買賣，成為士大夫與古籍市場間的重要中介，也有深入討論。論文最後則以兩個個案說明家族所藏豐富古籍被運用的情形：潘氏家族的豐富典籍有助於子孫取得科舉功名，讓潘家成為十九世紀蘇州重要的仕宦之家；席氏家族則利用藏書開拓他們的出版事業，到了晚清，席家的事業更擴展到錢莊、銀行的生意。誠如周紹明所言，透過藏書家族這條線索的追尋，往往讓我們在日益擴散的藏書家身分之外，看見某些家族長期擁有豐富藏書的事實；而對於善本書收藏與流通的研究，也能提供我們關於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獨特觀照視角與心得。

雖然以上六篇論文在會議期間分屬於兩個不同場次、不同議題，會議中也無直接對話與討論的機會。不過，如今被安排在同一本論文集出版，則有機會形構某種對話的關係。若我們以家庭、宗教、物質網絡作為觀察視角，可以在這兩組論文中串連出一些呼應的主題，或者提供一些未來研究和探索的可能性。如果我們選擇從「家庭」（家族）這個視角來看兩篇書籍史的論文，同樣可以看到許多豐富的訊息，無論書籍的收藏、出版事業的發展、書籍買賣與流通，家族往往是最重要的資助者與行動者，家庭也是出版、典藏、運用書籍的重要場域。家族如何經營出版事業？如何處理、傳承自己的書籍資產？如何利用出版業創造家族資產、或讓家族所擁有的文化資產發揮更多的效益？這些關於「書本」

的活動與其他的家族活動頗類似，也與家庭倫理息息相關。同樣的，研究出版與藏書的歷史學家也倚靠許多由家族所遺留下的史料來重建歷史。這個現象也提醒我們，在探討傳統明清社會文化時，「家庭」無論作為人群關係網絡、生活場域，或者倫理價值體系，確實在許多領域中都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宗教面向在四篇儒學論文中較清楚，主要因為在宋明理學與佛、道二教的關係原本就密切，從本書的論文中我們也看見，無論修養工夫、士人交遊、思想語彙和觀念、祭祀儀式，都體現儒學與佛、道二教及民間宗教的密切互動，彼此吸納影響的痕跡十分明顯。兩篇書籍史的論文雖然沒有觸及太多宗教的面向，不過包筠雅在出版分類說明中特別點出宗教類書刊的出版應另作考慮，我們可以想見對於宗教書籍出版之目的、機制、流通、典藏，以及這類書籍被接受和運用情形的研究，勢必同樣精彩，而各種不同類別的出版品之間的異同或相互影響，也值得探索。

至於書籍作為一種物質資產與知識載體，分析其分佈消長、流通模式的變化，的確讓我們觀察到許多與政治、經濟、思想相關的重要訊息。本書中四篇儒學論文雖未特別著墨於此，但出版和書籍史的研究對於學術思想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不僅思想史研究離不開書籍文本，士人或理學家的知識內容與認同感也與特定的書籍密切相關，而書籍因應不同需求及經濟條件所產生的流動與分佈，又往往與學術思想和學術社群的分佈有所呼應。這些面向雖受限於本書形成的條件，未能在本書中得到充分的發揮，但其重要性早已受到學界的重視。本系列由沙培德（Peter Zarrow）和張哲嘉主編的《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論文集對這方面也有更多的討論。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羅繼磊（Peter Bernard Lavelle）博士幫忙校對兩篇英文論文，助理陳胤豪、蕭琪，以及林勝彩博士協助全本論文的校稿工作，他們的貢獻讓本書得以順利出版。